

东亚  
汉字传播史  
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日本  
卷  
上

吕浩

著

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

非外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 日本卷 / 吕浩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2.6

ISBN 978-7-5500-4687-0

I. ①东… II. ①吕… III. ①汉字-文化传播-文化史-日本 IV. ①H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33709号

## 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

DONGYA HANZI CHUANBO SHI YANJIU · RIBEN JUAN

吕浩 著

---

出版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周振明
书籍设计	方方
制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41.5
版次	2022年9月第1版
印次	2022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4687-0
定价	99.00元(全二册)

---

赣版权登字 05-2022-4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绪 论	—
第一章 汉字传入与传播	八
第一节 金石文字	二〇
第二节 木简	三六
第三节 奈良时代古文书	四三
第四节 《万叶集》	五〇
第五节 《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私记》	五七
第二章 汉字接受与普及	七二
第一节 《玉篇》传入与传播	七三
第二节 《篆隶万象名义》	九七
第三节 《新撰字镜》	一一九
第四节 《倭名类聚抄》《类聚名义抄》	一二九
第五节 《色叶字类抄》《聚分韵略》	一四七
第六节 《倭玉篇》《下学集》	一五五
第七节 日本普及类辞书及其影响	一七四

第三章 汉字传承与发展	一七七
第一节 《玉篇》（梦梅校）	一七九
第二节 《新刻大广益会增修玉篇》	一九四
第三节 《增续大广益会玉篇大全》	一九八
第四节 《和尔雅》《日本释名》	二〇二
第五节 唐话辞书	二〇八
第四章 汉字规范与完善	二二〇
第一节 汉字存废之争	二二一
第二节 汉字政策的演进	二二六
第三节 信息时代的日本汉字	二三一
第四节 关于日本“国字”	二三四
参考文献	二三九
附录一 日本汉字传播史大事记	二四四
附录二 《倭名类聚抄》十卷本与二十卷本收词表	二五〇
附录三 《色叶字类抄》语辞表	二八〇
附录四 庆长十五年版《倭玉篇》字头表	三三三
附录五 日本当用汉字	六二九
附录六 日本常用汉字	六四〇
附录七 日本人名用汉字	六五一

## 绪 论

历史上，汉字学之大端无外乎二者：其一，自《仓颉篇》诸篇，而《说文解字》，而《字林》《玉篇》，而《字汇》《类篇》，而《康熙字典》，开枝散叶，无虑百十种。其二，经传注释，肇始于汉，隆盛于唐宋，至清不辍。且二者相互借力，共同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近百余年来，伴随考古进展，古文字研究成为显学。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对汉字理论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古史研究等有着巨大促进作用，一些学术难题得以解决，学术界称之为中国学术的第一次转向。可以称为中国学术第二次转向的是敦煌学，而第三次转向当是从域外看中国。第三次转向落实到汉字研究，当然就是跨文化汉字研究。

跨文化汉字研究因国际汉语教育而兴起，因域外汉字研究方向的开辟而成长，因跨文化汉字研究的提出而成熟。跨文化汉字研究这个提法源自李运富、何余华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简论跨文化汉字研究》一文不仅就跨文化汉字研究的界定、研究内容作出细致论述，还指出了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发展前景。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汉字文本资源研究、汉字传播及传播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学术史研究。<sup>①</sup>在汉字传播史一途，汉字在韩国、日本的传播史内容最为丰富，研究难度也最大。

---

<sup>①</sup> 李运富、何余华：《简论跨文化汉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一、什么是汉字传播

国内学者在汉字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一些成果，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等著作主要探讨汉字传播问题，不少文字学著作也涉及汉字传播研究，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张玉金和夏中华《汉字学概论》等。

传播虽然属于地域范畴，但汉字传播绝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地域，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地域，即汉字传播是指汉字跨越文化边界的传播。虽然汉字传播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文化的趋同，但汉字传播之前应是不同的文化体。

汉字传播还要涉及一个概念，就是接受。汉字及其载体（通常是带有汉字的物品）传入异文化域，只有被接受和相承使用才属于汉字传播范畴，否则就只是文献或物品传入而已，不能称为汉字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文献收藏在英国、法国，不能说汉字传播到了英法。而汉字在历史上传入东亚、南亚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域则属于汉字传播，汉字传播以后的发展历程都是汉字传播史的研究内容。

## 二、日本汉字传播史研究现状

汉字在东亚传播一方面是因为汉字文化的强势，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流动和贸易发展。商亡后，汉字文化随着箕子等人传入朝鲜。战国货币文字伴随贸易在朝鲜通行。汉代时置乐浪等四郡，汉字使用更加广泛，木简、封泥、印章、瓦当、漆器、青铜器等汉字资料层出不穷。汉字传入日本是东汉时期，建武中元年间（56—57年），倭国经乐浪官方引荐向东汉皇帝称臣，汉光武帝赐倭国王金印“汉委奴国王印”。汉魏六朝时期，带有铭文的货泉、铜镜、刀剑等不断传入日本。《隋书》言倭国“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其实不光是佛经，儒家经典《论语》也经百济传入日本，汉字使用逐渐频繁，金石、木简等不断出土，反映了汉字文化在日本早期的辉煌。日本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刀铭文、埼玉县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文标志着汉字已经用来记录日本语，铭文中的俗字字形反映了中国南北朝时代用字面貌。

日本推古朝时遣隋使、遣唐使、留学僧不断到隋朝、唐朝学习，圣德太子对学习和使用汉字大力支持，他用汉字颁布的宪法标志着汉字成了法定文字。《日本书纪》载，公元682年，境部连石积等人奉命编辑《新字》一部四十四卷。这是日本最古的辞书，它标志着接受和学习汉字的时代已经到来。公元730年，日本设立大学寮，全面负责教育与考试，《论语》《孝经》《文选》等成为主要学习和考试内容。

平安朝时嵯峨天皇更加重视与大唐的文化交流，留学僧最澄、空海等人回国后都被重用。沙门大僧都空海据顾野王《玉篇》编撰了《篆隶万象名义》，是中国辞书日本化的一个典范，真言宗寺庙保存至今的《玉篇》（残卷）和《篆隶万象名义》也是现今研究顾野王《玉篇》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僧人昌住在昌泰年间（898—901年）编撰的《新撰字镜》是第一部汉和字典，成为《倭玉篇》的先祖。五山版系列图书的刊刻，迎来了汉字文化大繁荣时代。

以上是日本汉字传播简史，这些内容在中国学者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大多已提及。日本学者冲森卓也《日本的汉字：1600年的历史》、冈井慎吾《日本汉字学史》也是从宏观上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日本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交流和汉语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著作和论文中反复述及的日本汉字传播史脉络。

汉字由传入到传播、由接受到传承、由普及到发展、由规范到完善是四个不同的层次，在日本汉字史上，后三个层次始终伴随着汉字的变异与再造，表现为汉字俗字形的出现和日本国字的出现。在俗字形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赵丽明、何华珍等取得一定成绩。在日本国字研究中，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中根元圭《异体字辨》、山本格安《和字正俗通》、伴直方《国字考》、山崎美成《文教温故》、冈本保孝《倭字考》、木村正辞《皇朝造字考》、菅原义三《小学国字考》、山田俊雄《近世常用的汉字》等都有所贡献。

日本汉文古字书专书如《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倭名类聚抄》《倭玉篇》等古辞书一直是中日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中日学者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域外汉字传播史内容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日本上世时期汉字传入与使用的研究、中世时期汉字字书专著的研究以及异体字、国字等相关研究都为本书研究储备了丰富的资料，使得更为精细地研究日本汉字传播史成为可能。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概念“日本汉字”的内涵问题。本书使用的“日本汉字”与“东亚汉字”结构一致，即汉字在日本、汉字在东亚，而不是日本的汉字、东亚的汉字。也有学者用“日语汉字”这个提法，我们也不认同，因为类似的结构“汉语汉字”是指汉语和汉字，而不是汉语里的汉字。也有学者提出“汉字语”概念，显然是忽视了字与词的本质差别。诚然，汉字传入日本，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学者称作日本化<sup>①</sup>），使得汉字在字种、字体、字义及用法等方面与中国汉字比有明显不同<sup>②</sup>，甚至产生了所谓的国字。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汉字的基本属性，并没有产生一种独立于汉字系统之外的新型文字，就像是汉字在不同的方言中也会有变异一样，不宜看作是汉字系统以外存在或者说变体。从另一方面讲，汉字的形是汉字形音义三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形音义统一体并非形音义并列，形与音义的结合是一种约定俗成，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古今变化如此，跨文化域变化也是如此。

### 三、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具体情况是：在古坟、飞鸟和奈良时代，日本汉字处在传入、接收与运用时期；在平安时代，日本出现了《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色叶字类抄》等汉字大型字书，是日本系统地学习汉字时期；在镰仓、室町时代，《倭玉篇》《下学集》《节用集》等普及字书不断拓展汉字在日本的使用范围。江户和明治时代，汉字字书有上百种，是汉字主体地位的巩固时期。大正和昭和时代则是汉字规范化时期，在规范化的过程中，汉字的使用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字符集。

① 冈井慎吾：《汉字的日本化》，载《国语文化讲座第二卷国语概论篇》，朝日新闻社，1994年。

② 笹原宏之：《国字的相位和展开》，三省堂，2006年，第357页。

基于上述时代特点，我们选取各时代典型材料进行断代系统量化分析，形成具有典范意义的域外汉字发展史案例。首先，与以往金石简牍研究、字书专书研究、汉语汉字学术史研究不同，本书研究从汉字传播学、汉字发展史视角入手，充分调查日本各时代汉字使用的字量、字频、异体和形义关系变化，在宏观上把握日本汉字发展规律，丰富汉字发展史内容。其次，日本古辞书研究将突破专书研究的藩篱，众多古辞书将纳入汉字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系统考察，同时结合不同时代的文书文本，调查二者的关系。最后，利用内阁文库藏大量的有关汉字存废、汉字用量及使用范围等内阁会议文件，梳理分析日本汉字政策的形成和政策导向及其对日本现代汉字使用的影响，结合《常用汉字表》（附内阁告示及内阁训令）及日本近世字书，考察日本现代汉字源流，完善日本汉字传播史。

#### 四、研究内容与思路

日本汉字由传入、接收、运用到接受、整理，再到调整、演进、普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时代特点相对明显，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要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在本书中，我们将分别从上世、中世、近世、现代四个阶段构建日本汉字传播史。以往的日本汉字传播或日本汉字史大多以他者文献如史书的记载去寻绎汉字传播史，而不是以本体文献即古文字材料、古字书本身去分析汉字的传播、使用与接受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宏观叙述替代了微观具体材料分析，使得日本汉字传播史有骨架而无血肉。本书计划从断代描写的层面，以古辞书收字及字样变化、形音义变化等为抓手，构建一部内容翔实、脉络分明的日本汉字传播史。

汉字由传入到接受、由传播到运用、由传承到创新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在日本汉字史上，后两个层次始终伴随着汉字的变异与再造，表现为汉字俗字形的出现和日本国字的出现，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汉字在日本传播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基于此，我们研究的总体框架是断代研究与专题研究互相配合，揭示汉字传播对日本语言文化的深层影响。

在断代研究方面，首先是上世日本汉字传入、接收与运用。这个阶段包含

弥生、古坟、飞鸟、奈良时代，这一阶段传世汉文资料主要有木简、金石、《日本书纪》等，结合具体文献作汉字定量分析。其次是中世日本汉字系统整理、接受与演进。这个阶段主要是日本平安、镰仓和室町时代，平安时代出现了几部大型字书，对这些字书尤其是《新撰字镜》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日本汉字在全面接收之后、有所接受之前的基本面貌。镰仓和室町时代，以《倭玉篇》为代表的一系列字书编撰，在字量、字形、形义关系等方面都有所调整，是字书日本化过程，也是汉字影响日语语辞的重要时期。再次是近世日本汉字普及与强化。这个阶段包含江户、明治时代，字书纷出，有上百种之多，极大地方便了汉字的传播与普及，不少字书被做成方便携带的小开本，在汉字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是现代日本汉字政策与影响。这个阶段包含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战后才一连串的汉字政策稳定了日本汉字字量、字形和具体运用领域，成为现今日本使用汉字的基础。

在专题研究方面，《玉篇》传播与日本化是日本汉字传播史的主线（《玉篇》在中国也是古代字书演进的主线）。《玉篇》传播是汉字文化圈最终形成和巩固的基本条件，因此研究《玉篇》不仅有现代语言学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影响研究领域也具有不可多得的实用价值。

《玉篇》是南朝梁代顾野王编撰的一部大型字书，不仅音义齐全，且例证庞博。经唐代孙强改编，宋代陈彭年等重修，一直流传至今。它是中国辞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字书，也是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字书，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和维系都依赖《玉篇》的传播和演进。在韩国，“玉篇”是汉文字典的代名词；在日本，《玉篇》经过传抄、翻刻、改编、增补等形成了大量版本，也出现了不少《倭玉篇》版本，形成了“玉篇系”文献系统<sup>①</sup>，日本历史汉字使用及当代汉字使用都与《玉篇》有着深度关联。

系统考察《玉篇》众多版本可以发现，在《玉篇》日本化过程中有多种版

<sup>①</sup> 有传抄本原本《玉篇》残卷，翻刻本如五山本、庆长九年本《大广益会玉篇》等，也出现了一些加注训读假名的版本如日本宽永年间的系列刊本及后续翻刻本。其改编本如《篆隶万象名义》、《玉篇》梦梅本、《倭玉篇》、《下学集》、《节用集》、《新刊大广益会增修玉篇》、《字林玉篇大全》等。

本参与其中，在不同时间段以不同的方式左右着《玉篇》在日本的演进轨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汉字的使用。

## 五、研究特色与目标

汉字发展史研究近些年成为学者们研究热点，断代量化研究取得一定成绩，先后出版了几种大型图书如《中国文字发展史》等。但“域外汉字发展史”至今仍阙如，本书即是这一领域的首次尝试。

域外汉字传播，日本虽然不是最早的，但无疑是最深广的。即便是在假名出现之后，汉字的使用与影响并未受到阻碍，汉字地位反而得到加强。江户、明治时代大量的普及汉字教育的字书不仅彰显了汉字的接受程度，而且对现代日本汉字的使用与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字书的传入以及字书日本化都直接影响到日本汉字使用与接受，从日本现藏的古代字书看，其数量和清晰的传承脉络一点也不逊色于母国的字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字书专书研究应纳入汉字传播史研究之中，通过不同时代的字书对比分析统计，就能清晰地观察日本汉字在字量上的消长、异体的分合等基本面貌。

已有的日本汉字史主要是在综合叙述，述说汉字传入、运用、字书出现、假名出现等环节，缺少具体的可连续考察的线索，本书以古辞书为主要线索从字量、异体字、形义关系变化等方面细致地描写各个历史时期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发展情况，以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日本汉字传播史，这也是本书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另外，日本近代汉字政策影响下所形成的相关汉字字集，以及明治时代字书对字集的影响，也是本书的新内容。

本书还涉及现代汉字政策及相关字集，以及明治时代字书对字集的影响，这是本书的新内容，也使得本书形成了日本汉字通史。

## 第一章 汉字传入与传播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孔子与老子以及随后的百家争鸣，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性格，成就了烛照世界的灿烂文化。汉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性格基因载体，以其自身的承续与进化，引导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演进。大汉的强大，大唐的繁荣，首先表现为文化的繁荣和强势，也正是一个文明化育万邦的力量所在。

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随着考古发现而不断前移，1951年在大阪府和泉市黄金冢古坟考古中发现了一面神兽镜，其上有铭文曰：“景初三年，陈是作铭铭之，保子宜孙。”这面铜镜的出土与传世文献形成呼应，即《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sup>①</sup>后又诏书报倭女王，特赐绢帛、铜镜、刀等物品。和泉市黄金冢古坟中出土的铜镜也应是魏明帝曹叡所赐。

1958年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考古发现了一片“贝札”，上书“汉隶”二字<sup>②</sup>，由其他陪葬物推定该墓时代为公元前3世纪左右，这似乎可以说明汉字早在战国末期就进入了日本。

史书中记载早期与倭国交往发生在汉代，《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

<sup>①</sup> 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93页。

<sup>②</sup> 斋藤忠編集：《日本考古学论集》之十，载《日本和大陆的古文化》，吉川弘文馆，1987年，第137页。

授。”<sup>①</sup> 说的是建武中元二年（57年）汉光武帝刘秀赐金印给倭国国王，这与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有“汉委奴国王”铭文的金印（现藏于福冈市美术馆）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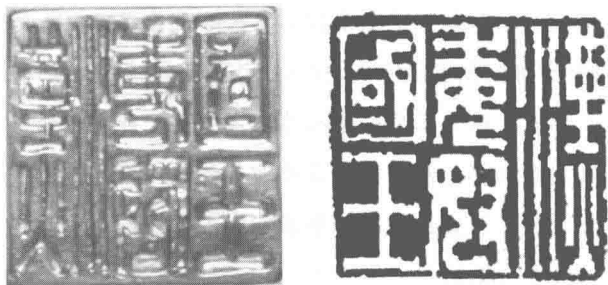


图 1-1

从上述出土文物与史料看，实物汉字传入日本始自汉代有确证，始自战国末期多少有些疑问，即：先秦时期何以有“汉隶”这样的文辞？虽然《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徐福出海求仙记载，但目前出土的实物文字并不能支持徐福等人东渡到日本。因此，汉字传入日本的时代应保守地定在汉代，而且是东汉。日本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广岛、京都、大阪等地都出土过汉代有铭文“货泉”“货布”的钱币，也能证实这一判断。另外，日本东大寺山古坟出土金象嵌铁刀，其铭文曰：“中平庚午五月丙午，造作文刀，百练清刃，上应星宿，下辟不淑。”<sup>②</sup> 中平（184—189年）为汉灵帝刘宏年号，中平无庚午，当是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时间之差或是地域遥远、讯息不能畅达之故。

有了汉代的交流，魏时中日交往更为频繁。据《三国志·魏书》，从魏景初二年（238年）到魏正始九年（248年）的短短10年间，双方使者往来7次，分别在景初二年（2次）、正始元年（2次）、四年、六年和八年，其中正始元年这次还有“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sup>③</sup>。当然，“答谢恩诏”应是出自魏人

①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21页。

② 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けやき出版社，2016年），第278页。

③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857页。

之手，但可以说明倭王已经可以通过汉字文书与魏皇帝交流了。当然，倭魏交流还有不少铜镜铭文证据。录于下<sup>①</sup>：

1. 青龙三年方格规矩四神镜铭：青龙三年，颜氏作竟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详，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寿如金石宜侯王。

2. 景初三年画文带神兽镜铭：景初三年，陈是作谿谿之，保子宜孙。

3. 景初三年三角缘神兽镜铭：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吏人谿之，位至三公；母人谿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4. 景初四年盘龙镜铭：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作镜。吏人谿之，位至三公；母人谿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5. 正始元年三角缘神兽镜铭：正始元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州师，杜地命出。寿如金石，保子宜孙。

魏时的文字交流使倭王认识到学习汉文的紧迫性，倭王把目光投向了百济这个更早接受汉字汉文化而又近在咫尺的王国。《日本书纪》载：

（应神）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即养于轻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曰厩坂也。

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

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始祖也。<sup>②</sup>

① 铜镜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铭文相同的铜镜每有不止一面出土。

② 见《日本书纪》“阿直岐等来归”条，载《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1971年。

又《古事记》载：

亦百济国主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雄马雌马各壹以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

天皇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士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有和迩吉师。此人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而一同贡进。而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sup>①</sup>

两文献相对照，《古事记》中的“和迩吉师”便是《日本书纪》中的“王仁”的日语音读，应神十六年（285年）自百济国前往日本的王仁带去了《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这也可能就是当时的汉文教材。然而，这里说的《千字文》应该不是南梁周兴嗣（469—537年）编纂的《千字文》，或是《古事记》记录之误，或是当时有另一种“千字文”材料。<sup>②</sup>不过当时通行的教学材料很可能是《急就篇》，但汉以后的《急就篇》有2144字，王仁在百济及日本用于教学的或是删节本。

日本有了汉文老师，无疑有利于汉字学习与使用。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布展有“七支刀”，因其刀两侧各有三个分支而得名。刀铭<sup>③</sup>曰：

泰始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钢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侯王，永年大吉羊。（正面）

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子，奇生圣德，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反面）

① 见《古事记》“百济之贡”条，载《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1971年。

② 从日本木简资料看，出土《论语》木简的地方往往伴有《千字文》木简，而且这些木简都是习字简，这也说明《论语》和《千字文》是当时通行的汉语汉字学习教材。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导致《古事记》误记。

③ 铭文源自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中央公论社，1983年），略改。

日本九州熊本县玉名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了大约作于倭王珍时代（438年曾遣使南朝宋）的大刀，其上铭文曰：

治天下获加多支鹵大王世。奉为典曹人名无利弓<sup>①</sup>。八月中，用大王铸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为十握三寸上好扞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往往得王恩，世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和，书者张安也。<sup>②</sup>

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坟出土大刀，其铭<sup>③</sup>曰：

辛亥年七月中记<sup>④</sup>。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埵，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弓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弓比。（正面）

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反面）

兵器铭文自战国就习见，然寥寥数字，初无有类此长篇者。

上述三刀之第一刀“七支刀”应是百济所铸，其余二刀乃铸于日本，因而此二刀铭文为汉字，文辞为汉语，只是其中人名、地名皆日语音译，如获加多支鹵（ワカタケル）、无利弓（ムリテ）、伊太和（イタワ）、乎获居（ラワケ）、意富比埵（オホヒコ）、多加利足尼（タカリスクネ）、弓已加利获居（テヨカリワケ）、多加披次获居（タカハシワケ）、多沙鬼获居（タサキワ

① 弓为氏俗字形，汉魏六朝碑刻中习见。

② 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略改。

③ 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略改。

④ “七月中”，日本森博达《日本书纪成立的真相：重写的主导者是谁》以“中”字用法为例论述稻荷山铁剑铭文受到朝鲜三国影响，董志翘《〈日本书纪〉中特殊语言文字现象考察》（《南京师大学报》2017年第2期）已详细论证这种用法在《史记》中已大量出现。

ケ)、半弓比(ハテヒ)、加差披余(カサハヤ)等皆人名,斯鬼(シキ)疑地名。

从长文刀铭的汉文功底看,铭文作者应是汉人,或是汉人后裔,江田船山古坟刀铭“书者张安也”便是明证。但作刀者“伊太和”,一作“伊太加”,据考证是日本第十八代天皇——反正天皇<sup>①</sup>,而稻荷山古坟刀铭中的“获加多支鹵”是日本第二十一代天皇——雄略天皇,即《宋书·蛮夷传·倭国》中的“倭王武”。这位倭王武在公元478年上表南朝宋顺帝,其文曰: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祚,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篲。居在谅闇,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sup>②</sup>

此表文辞迤邐而畅达,颇有六朝骈文之风格,其中有可能是沈约编入《宋书》时做了润饰,但该表出自汉人之手无疑。《南史·夷貊传下》也有该表部分内容,移录于下,以相对照:

自昔祖祚,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陵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道迳百济,装饰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臣亡考济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

① 末永雅雄:《日本的武器大刀和外装》,雄山阁书店,1992年,第66—67页。

②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5页。